

許燚輝 主編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第七編 第十七冊

## 聲符示源與詞族構建研究

王 勇 著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七 編

許 燦 輝 主 編

第 17 冊

聲符示源與詞族構建研究

王 勇 著



T1621318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聲符示源與詞族構建研究／王勇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148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七編；第 17 冊)

ISBN 978-986-322-857-8 (精裝)

1.聲韻學 2.詞義學

802.08

103013633

ISBN-978-986-322-857-8



9 789863 228578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七 編 第十七冊

ISBN : 978-986-322-857-8

## 聲符示源與詞族構建研究

作 者 王 勇

主 編 許鈞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七編 19 冊 (精裝) 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聲符示源與詞族構建研究

王 勇 著

## 作者簡介

王勇，男，1986年秋生於湖北當陽，現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博士生。2004年入三峽大學中文系學習漢語、文學、師範等課程。2008年至東吳勝地，求學於蘇州大學，問學於王衛峰先生，研習上古漢語。2012年於蘇州執教一年之後負笈西蜀，入四川大學，師從雷漢卿先生研習中古近代漢語。已獨撰、合撰多篇文章。參與了《100年漢語新詞新語大辭典（民國卷）》的編纂校訂工作，目前正在撰寫《當代流行語的社會價值研究》《近代漢語方俗詞探源研究》。

## 提 要

「聲符示源」是一個古老而又充滿魅力的話題，早在東漢時期，劉熙的《釋名》已肇其端，「右文說」緊繼其踵，「字母說」更進一步，綿延近兩千年而至今，仍是饒有趣味且極具學術價值的論題。本書認為，「右文說」在融入「因聲求義」的內核之後，突破了傳統的以單一聲符系聯同族詞的局限，可以用來構建詞族。以此為出發點，本書圍繞「聲符」這一核心詞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得出以下結論：語詞滋生促使形聲字的孳乳，形聲字的聲符具有示源性；語詞滋生的層次性、多向性和聲符假借共同促成聲符義的多元性；聲符義的運動與詞義的引申具有同律性，詞義引申的研究成果可用以指導聲符義引申義列的梳理，聲符義引申義列可以反映語詞滋生的層次；同一聲符的多個聲符義之間存在平行、因果、相反、變易等密切關係；少數聲符義與其他聲符義無聯繫，這多是聲符假借的結果。聲符假借多出現在音同或音近的聲符之間，而音同或音近的聲符亦有同源的可能。因此，我們系聯同源聲符，釐清同源聲符的衍生譜系，這不僅擴大了詞族系聯的範圍，而且有助於我們找到假借聲符的本字。在上述結論的基礎上，本書提出利用同源聲符和聲符義的引申義列系聯同族詞的方法。



#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同源詞研究方法的歷史沿革	7
第一節 聲 訓	8
第二節 右文說	10
第三節 因聲求義	15
第四節 詞源研究之檢討	17
第五節 本研究的出發點、目的、資料及方法	20
第二章 語詞滋生與形聲字的發展	25
第一節 相似類比滋生促使形聲孳乳	26
第二節 相關聯想滋生促使形聲孳乳	28
第三節 引申分化滋生促使形聲孳乳	29
第四節 語音變易滋生促使聲符的替換	30
第三章 聲符示源諸問題	33
第一節 引 論	33
第二節 以詞義結構與形聲結構的對應性明聲符 兼義	36
第三節 綴加意符明假借義的形聲字	37
第四節 聲符研究的正確角度——語言學視角	40
小 結	41
第四章 對「語源義」的質疑	43
第一節 「語源義」立論之本的問題	44

第二節	「語源義」混同詞彙義與字義	45
第三節	「語源義」對相關理論的疏忽	47
第四節	輕言某義為約定俗成的原始意義	53
第五節	借音分化的兩分	55
小 結		56
第五章	聲符多義的成因	61
第一節	滋生的多向性	62
第二節	滋生的層次性	65
第三節	聲符假借	68
第六章	同一聲符各聲符義之間的關係	71
第一節	平行關係	71
第二節	因果關係	74
小 結		82
第七章	詞義引申與語詞滋生的關係	85
第一節	詞義引申分化新詞	86
第二節	詞義引申與聲符義引申具有同律性	86
第三節	語詞的理據往往成為語詞的直接引申義	89
第四節	語詞引申的兩個方向與語詞的滋生	90
第八章	聲符義引申義列對詞族系聯的啟示	95
第一節	詞族研究面臨的問題	95
第二節	聲符義引申義列對同聲符語詞滋生層次的揭示	97
第三節	聲符義引申義列的參照作用	101
第九章	同源聲符在詞族系聯中的價值	103
第十章	詞族構建的新思路	113
第一節	《文始》之得與《同源字典》之失	114
第二節	詞族構建方法的新構想	120
總 結		125
附 錄	「八族」聲符滋生譜系	127
參考文獻		145

# 緒 論

## 一、緣起

漢語詞源的研究肇端於聲訓，聲訓濫觴於先秦而風行於兩漢。文字學巨著《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中有大量的聲訓材料，我國第一部詞源學著作——《釋名》也成書於此時。逮至南唐，聲訓仍是古人探源的重要方式，徐鍇在《說文解字繫傳》中也運用聲訓探尋語詞的源詞。從晉至宋，「右文說」又得以提出、發展、深化與運用，「右文說」對漢語詞源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降至乾嘉，「聲近義通」的規律得到發掘，「因聲求義」的訓詁方法應運而生。在傳統語言學中，詞源研究包孕於訓詁之中，人們對詞源的探討也是以詞義的獲取與確證為主要目的的，因而，「聲近義通」的理論與「因聲求義」的方法也同樣適用於詞源研究。

前修時彥孜孜以求，為我們積累下豐厚的研究資料及較為適用的研究方法。詞源研究雖然歷經了兩千多年的發展，但我們仍然不能說真正的漢語詞源學已經建立起來了。王衛峰先生說：「在同源詞的性質、關係、變化方式等根本理論問題上，仍然有一些困惑和不足，同時在系聯方法上也有待改進。對同源詞的聚合關係研究一般僅僅滿足於系聯，而對於它們的繁衍滋生過程和方式卻未多措意，不顧詞族的層次序列，不分源流親疏關係，系聯結果缺乏系統性。」

〔註1〕由此可見，詞源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尚待完善。這正是我們想在這一饒有趣味而又艱深繁雜的問題上作一番思索的原因。

語詞滋生形成聚族而居的同源詞，滋生研究與同源詞研究密切相關。語詞滋生需要在文字形式上反映出來，以確定滋生詞在詞彙系統中的獨立地位，因而語詞的滋生驅動了文字的孳乳，文字孳乳又形成了大量的形聲字。這些形聲字多為在源字（記錄源詞的漢字）的基礎上綴加形符而成，綴形完成後，源字變成既表義又表音的聲符，記錄同源詞的諸形聲字共用聲符，因而，聲符便有了示源性。形聲字及時地記錄滋生成果、同聲字反映同源詞的現象也得到訓詁與文字研究者的認同。王衛峰先生說：「字形變化規整有序，形體具有傳真功能，可能承載詞源資訊，常會保留一些已在語音和詞義中不易發覺的詞源關係，透過形體演變常能窺知詞彙派生的歷史層次和滋生順序。」〔註2〕把握聲符的示源性，在系聯過程中運用比較互證等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小心求證，這樣得出的結論當是可靠的，再以這些同源詞系列作為資料探討同源詞的滋生規律、同源詞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得到可靠的結論，能夠增強詞源研究的實證性。

漢語詞源研究常常以「同源詞」或「同族詞」來指稱研究對象，在本書的開始我們要對這兩個術語的內涵作一些必要的交代。我們對待這兩個術語的態度與王力先生一致，他在《同源字典·序》中說：「從前我曾企圖研究漢語的詞族，後來放棄了這個計劃。」〔註3〕可見「同源詞」與「同族詞」的內涵並不相同，但王力先生沒有明確指出二者的不同之處及二者的聯繫。任繼昉先生取「同族詞」這一術語指稱「具有同一音義來源的詞」，又立「詞群」這一術語來指稱「同族詞中屬於同一個意義層次的同族詞的群體」，〔註4〕這就相當於王力先生所說的「同源詞」。任先生對「詞族」與「詞群」的區分具有極其深刻的內涵——同源詞是有共同的核義素的同族詞，同族詞由一個或多個同源詞組構成。本文使用「同族詞」與「同源詞」便是以上述內涵為基礎的。

〔註1〕王衛峰《上古漢語詞彙派生研究》，百家出版社，2001年，4頁。

〔註2〕王衛峰《上古漢語詞彙派生研究》，百家出版社，2001年，7頁。

〔註3〕王力《同源字典·序》，《王力文集》卷八，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2頁。

〔註4〕詳參任繼昉《漢語語源學》（第二版）相關章節，重慶出版社，2004年。

## 二、語詞滋生原理

漢語詞彙的發展，經歷了原創、滋生、綴加、合成四個階段。眾所周知，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音義的結合是任意的，不可論證的。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也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名實。」這同樣是承認語詞產生之初名實關係的社會約定性。就原創階段產生的語詞來說，確實有部分語詞的音義關係是無法論證的、任意的，但以此觀點來概語詞音義關係之全則難免有「天圓地方，不可盡覆」之難。我們歷來強調索緒爾對語言符號音義關係任意性的觀點而忽視了他對「絕對任意性」和「相對任意性」的區分。他說：「符號任意性的基本原則並不妨礙我們在每種語言中把根本任意的，即不能論證的，同相對任意的區別開來。只有一部分符號是絕對任意的；別的符號中卻有一種現象可以使我們看到任意性雖不能取消，卻有程度的差別：符號可能是相對地可以論證的。」<sup>〔註5〕</sup>部分原創詞的音義關係是絕對任意的<sup>〔註6〕</sup>，而在原創詞的基礎上滋生而成的滋生詞以及後來的綴加詞、合成詞的音義關係是可論證的。

滋生是指新詞在舊詞的基礎上產生，並且繼承舊詞的音義關係，滋生詞完全繼承源詞的語音或在聲韻調某一方面稍作調整以別於源詞。滋生是漢語詞彙擴張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語音資源是有限的，在原創階段中，語音資源得到了充分配置並奠定了一種語言的基礎語音系統。語言的音位系統是封閉有限的，各民族的發音習慣又對語音數量有所耗損，然而隨著人類知識面的擴展、認識的深化和思維的精密化，所要表達的思想層出不窮，人們在造詞達意的時候一定會遭遇音不敷用的困境。在此情況下，我們有兩種選擇：滋生與合成。合成是一種相當實用而能產的構詞方式，然而對於上古漢語來說這一方式卻難以為用。上古漢語語詞的單音節性質決定了其詞彙擴張只能採用滋生的辦法。滋生又有四種方式：引申分化滋生、相似類比滋生、相關聯想滋生、語音

〔註5〕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9年，181頁。

〔註6〕 任繼昉先生認為語根主要有自然的發聲、動情的感歎、音響的模擬、形態的模仿等來源，未提及約定俗成。任先生所指出的四大來源當是可信的，由於我們無法排除部分原始詞（詞根）約定俗成的可能性，因此我們的論述依然依照傳統觀念，承認部分原始詞音義關係的任意性。任先生觀點請參見《漢語語源學》（第二版），重慶出版社，2004年，65～86頁。

變易滋生。

引申分化滋生指詞義引申導致的語詞的分化。詞義引申是指「詞義從一點出發，沿著本義的特點所決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習慣，不斷產生相關的新義」〔註7〕，它是詞義運動的主要方式。詞義引申所形成的直接結果便是同一語詞形式（語音形式與書寫形式）承載了多個相關義項，並且這些義項可能由於遞相引申和輻射引申而導致關係上的疏離。爲了減輕該語詞的形式的負擔，使其表義清晰化，這些義項便可能脫離母體成爲獨立的語詞。這些從母體脫離出來的分化詞與其母體的關係是滋生詞與源詞的關係，即它們同源。

相似類比滋生的基礎是「同狀異所」與「異狀同所」，「狀」即形態，「所」即實質，所謂「同」即相似性。這裡的相似性既指客觀相似性，又指主觀相似性，即人們認爲兩物有相似之處。相似類比滋生的過程，即甲物有名，乙物新被人們接觸，乙物與甲物或「同所」或「同狀」，人們便以甲物之名名乙物。這種方式的重大特點是滋生詞多爲名詞。

相關聯想滋生的基礎是事物之間的緊密聯繫。這種聯繫可以表現爲相關、相反等關係。相關可以是物物的相關，例如，鳩，《說文·丸部》：「鷲鳥，食已，吐其皮毛如丸。」鳩因其所吐之物如丸而得名；可以是物事的相關，例如，魚：漁，漁因其對象「魚」而得名；可以是實物與抽象概念之間的關係，例如，人：仁，弟：悌。相反關係如，本：末。

語音變易滋生是指由地域差異、古今懸隔產生的自然音變而導致語詞的滋生。語詞的音變最初並不直接滋生語詞，而是形成「同實異名」的情況。繼發的音變使表示「同實」的各「異名」之間的關係更加疏遠，致使人們不能再覺察它們本是一聲之轉，或由於經濟原則的驅使，人們有意地用這些「異名」來承載略有區別的意義，新的語詞便形成了，新詞與舊詞便是滋生詞與源詞的關係。揚雄的《方言》爲我們提供了較多音轉滋生的資料。

上述滋生方式又可概括爲兩種，即詞義引申的分化、語音的流轉變換。這一劃分是張博先生根據章太炎《文始》中的「變易」「孳乳」兩術語及沈兼士的分類推衍而來的。〔註8〕與滋生方式相應，張先生又提出「義衍同族詞」「音轉

〔註7〕 王寧《訓詁學原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年，94頁。

〔註8〕 沈兼士指出：「語言之變化約有兩端：（一）由語根生出分化語；（二）因時間或空

同族詞」的概念。楊光榮先生也有類似的分類，即「理據式同源詞」「音轉式同源詞」。<sup>〔註9〕</sup>與二位先生相比，我們所劃分的滋生方式較為複雜。張博先生將音轉滋生外的語詞滋生現象統稱為引申分化，這一做法不利於探討詞義引申與語詞滋生的關係，因為並非所有的義衍滋生都是由源詞引申義分化而成的，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的論述中討論。

語詞滋生的結果是形成同族詞，並促使記錄這些同族詞的形聲字的孳乳。形聲字的產生與發展將在第二章詳細討論，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之所以要略述語詞滋生的原理，是因為它與同族詞滋生、形聲字孳乳密切相關。王衛峰先生在《上古漢語詞彙派生研究》一書中曾多次論及語詞滋生、同族詞、形聲字之間的關係，並闢專章討論詞彙滋生和文字孳乳，這為我們從文字的角度反觀同族詞諸理論的有理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

間的變動發生之語轉。」章太炎將「變易」和「孳乳」界定為：「音義相離，謂之變易；義自音衍，謂之孳乳。」張博先生說：「『變易』指詞的聲音和形體發生變化而意義未變，『孳乳』指詞義引申導致的分化而語音相因或稍有變化。這樣，章氏在用『變易』和『孳乳』說明同族詞的滋生途徑和音義關係的同時，實際上已較為清楚地把同族詞區分為兩種類型。」張博《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商務印書館，2003年，37~39頁。

〔註9〕該類同源詞（理據式同源詞），主要是由義的裂變而形成的，在裂變過程中，或音隨義轉，或保持恆定。參見楊光榮《詞源觀念史》，巴蜀書社，2008年，112頁。



# 第一章 同源詞研究方法的歷史沿革

事物的得名之由自古以來備受人們關注，早在東漢時期就產生了以聲訓為探源方式的詞源著作——《釋名》。它反映出古人對語詞音義關係的模糊認識，開啓了漢語名源研究的大門，使詞源研究成為傳統語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聲訓作為探源手段，歷來為語言文字研究者所重。降至宋代，「右文說」應運而生。

「右文說」的產生是詞源研究方法上的一大進步，使詞源研究有了更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使詞源研究從單個語詞的探源發展為同族詞的系聯。「右文說」歷經宋至清的發展，理論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與此同時，部分學者對「右文說」產生了錯誤的見解，將「右文說」導向了一個極端。如段玉裁好用「凡從某聲皆有某義」的全稱肯定，黃承吉說「蓋凡字之同聲者，皆為同義」。<sup>〔註1〕</sup>前者將同聲符諸字的詞源單一化，以偏概全，後者將音義關係絕對化。後來劉師培將黃承吉的「同聲」推衍至同部，這又走得更遠。清代小學隆興，文字、音韻、訓詁全面發展，乾嘉學者提出了「聲近義通」的理論，並產生了「因聲求義」的訓詁方法。這一方法的產生，為詞源研究帶來了新契機，使學者們突破文字形體的束縛來研究音義關係，但是也產生了不良影響，它使研究者們拋棄了「右文」這一研究詞源的利器。《文始》《同源字典》都否認了「右文說」。章太

---

〔註1〕 蔣紹愚《古漢語詞彙綱要》，商務印書館，2007年，164頁。

炎在《文始·敘例》中有「六書殘而爲五」之嘆。<sup>〔註2〕</sup>王力先生說：「聲訓對中國後代的詞源學既有不良影響，也有良好影響。不良影響的結果成爲『右文說』。」<sup>〔註3〕</sup>目前爲止兩部最重要的詞源學著作卻都摒棄了「右文說」，實在是極大的遺憾。

## 第一節 聲 訓

聲訓濫觴於先秦，其作用最初只在於增加立論的可信性，言之成理即可，因而在訓釋字的選取上有較大的隨意性，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探源方式。

降至漢代，聲訓一方面延續了先秦的傳統，爲政治、哲學服務，旨在闡發與封建社會有關的道德倫理、名物制度，《白虎通義》是這一方面的代表。另一方面，聲訓成爲了訓詁學工具，「它始於漢初《詩經》的毛傳，發揚光大於鄭玄的注經。」<sup>〔註4〕</sup>聲訓自此進入了語言學領域，並因此產生了詞源學的奠基之作——《釋名》。

《釋名》的作者劉熙是以探源爲目的而使用聲訓的第一人。因其主旨便是探求事物得名之由，所以在訓釋字的選取上要力避穿鑿。劉熙的撰述主旨決定其探源的自覺性，所以他的結論有很多可取之處。劉熙所在之漢末距漢語發生之時不知幾千萬年，古今懸隔，語音流轉，語詞的滋生理據及其源詞多已湮沒難曉，這必然導致劉熙撰述之時不能爲每一個被釋詞找到確切的源詞與得名之由。再者，並非所有的語詞都有源可尋，約定俗成的原始詞是無源可求的，它們的音義關係是任意的。《釋名》以音同音近的語詞來訓釋被釋詞，揭示其得名之由。然而上古漢語中，語詞以單音節爲主，同音詞不勝枚舉，劉熙何以能保證他所尋得的訓釋詞便是被釋詞的源詞或者同族詞呢？

首先是「聲近義通」，但聲近並不一定義通。我們認爲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人們所把握的事物的特徵。劉師培云：「數物一名之故，不俱由物形物音物文

---

〔註2〕 章太炎《文始·敘例》：「《文始》所說亦有媵取本聲者，無過十之一二。甚懼學者或有錮駭復衍右文之緒，則六書殘而爲五。」《章氏叢書·文始》，浙江圖書館校刊，1917~1925年。

〔註3〕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69頁。

〔註4〕 王鳳陽《漢語詞源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代序）》，見張希峰《漢語詞族續考》，巴蜀書社，2000年，3頁。

之相同也，一曰別之以顏色，一曰別之以種類。」〔註5〕《物名溯源》：「今考其（引者按：指動物植物）得名之由，或以顏色相別，或以形狀區分。」〔註6〕可見，人們為事物命名不以質體物類分別，而以外在特徵區分。如此，則事物最顯著的特徵便最有可能被人們把握，並因之為事物定名。這一特徵又通過三種途徑成為人們心目中這一事物的根本特徵，這三種途徑分別是：一、這一作為命名之由的特徵依然表現為事物的顯著特徵，容易被人們感受、把握；二、詞源意義隱含於詞彙意義之中，人們可以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三、「古人之名物非苟焉而已，既以名加物，則各物之狀態形質已隱該於字音之中。」〔註7〕某一意義特徵總是與一定的語音相聯繫，人們發現這一規律，聽到某聲音便想到與之相應的意義，即形成語音聯覺。在語詞的使用過程中，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得特徵與依其命名之事物的密切聯繫在人們的心理上得到鞏固和強化。這些因素使得《釋名》有較高的成功率。

劉熙的貢獻不僅僅在於它探明了一些名物詞的源詞，通過探源保留了一些研究古音的資料，還在於他闡明了事物得名之由。而他用以闡明事物得名之由的訓詞中，實際上暗涵源詞與滋生詞之間的意義聯繫，如相關、相似、因果等，這對我們探討語詞的滋生方式和規律是很有幫助的。如《釋名·釋形體》：「臍，枝也，似木之枝格也。」人的肢體因與樹木之枝格有相似性，故有相同之名。《釋名》於《說文》後問世，當時形聲字早已經發展為漢字的主流，故而在劉熙的訓釋中往往會有同聲符字相訓、以聲符訓從其得聲之字、以形聲字訓其所從得聲之聲符的情況，這無疑為「右文說」的產生提供了參照。王衛峰先生說：「同聲符字的義通現象在《釋名》中已經較為普遍地被揭示出來，《釋名》已經孕育了右文說的胚胎。」〔註8〕

《釋名》以聲訓為其唯一的探源方式，所以其成就與不足直接顯現了聲訓

〔註5〕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左盦外集·正名隅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47頁。

〔註6〕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左盦外集·正名隅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433頁。

〔註7〕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左盦外集·正名隅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445頁。

〔註8〕 王衛峰《上古漢語詞彙派生研究》，百家出版社，2001年，188頁。

作為探源方式的可取與不足之處。其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為主觀任意性，「同一個詞，既可聲訓為此，又可聲訓為彼；某甲可聲訓為此，某乙可聲訓為彼。這種情況，明顯地反映出『聲訓』的主觀隨意性。」〔註9〕其可取之處在於用「音近義通」的詞訓釋被釋詞，這符合同源詞關係的事實，正因如此，劉熙的探源才能取得成功，「音近義通」這一標準才為後來的詞源研究者所遵循。王鳳陽先生說：「就這一點說，釋名時期既是同源研究的發軔時期，又是詞源研究基本原則的奠基期。後來的探索者不過是不斷根據語言文字研究的新成果去豐富它，去限制它，以減少其朦朧性，增加其精密度而已。」〔註10〕王力先生說：「（聲訓）良好影響的結果成為王念孫學派的『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註11〕

聲訓對我國語言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讓我們注意到聲義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我國詞源學的奠基之作《釋名》，從而奠定了「聲近義近」的探源原則；「聲近義近」的客觀規律催生了重要的「音近義通」理論；《釋名》顯現出同聲符字的音義關係，孕育了「右文說」。

## 第二節 右文說

一般認為，「右文說」肇端於晉楊泉，確立於宋王聖美。它是受聲訓影響而產生的以形聲字聲符為綱的探源方式。

「右文說」從確立至現在，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逐漸趨於完善，發展為今天最主要、最可靠、最高效的系源方式。王聖美之後的學者對「右文說」的補充完善大致有以下幾點：

### 1. 王觀國「字母說」。

宋人王觀國在其著作《學林》中明確提出「字母」這一術語。他說：「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為鑪，加火則為爐，加瓦則為甌，加黑則為黷。」〔註12〕

〔註9〕 蔣紹愚《古漢語詞彙綱要》，商務印書館，2007年，160頁。

〔註10〕 王鳳陽《漢語詞源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代序）》，見張希峰《漢語詞族續考》，巴蜀書社，2000年，5頁。

〔註11〕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王力文集》卷十二，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69頁。

〔註12〕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84頁。